

# 張三丰與明帝

黃兆漢

張三丰是元明之際的一個大道士，活動時期約由元延祐年間（1314—1320）到明永樂十五年（1417）。<sup>1</sup>《明史》有他的傳記。<sup>2</sup>大概是因為他的後期活動在明代和《明史》有傳，故此他被視作為明人。除《明史》外，其他可靠的史籍，如焦竑（1541—1620）的《國朝獻徵錄》、<sup>3</sup>傅維麟（1646年進士，1667年卒）的《明書》、<sup>4</sup>王鴻緒（1645—1723）的《明史稿》<sup>5</sup> 都有他的傳記。此外，地方志如任自垣（約1431年前後生存）的《太嶽太和山志》、<sup>6</sup>任洛（約1488年前後生存）的《遼東志》、<sup>7</sup>馬理（1474—1555）等的《陝西通志》、<sup>8</sup>李廷龍等的《南陽府志》、<sup>9</sup>吳道邇（約1584年前後生存）等的《襄陽府志》、<sup>10</sup>方應選（1583年進士）與張維新（1577年進士）的《汝州志》、<sup>11</sup>杜應芳

1 參看拙文“*The Cult of Chang San-feng*”,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79), Vol. XVII, Nos. 1 & 2, pp. 10-53, 尤其是pp. 44-45, 52-53。

2 《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47），卷299，頁7641。

3 《國朝獻徵錄》收錄有關張三丰的傳記四篇。第一篇是藍田（1477-1555）撰的《張三丰真人傳》，第二至第四篇沒有註明作者。然事實上，第二篇是取自吳道邇等編的《襄陽府志》（1584年編），第三篇取自楊儀的《高坡異纂》（約成書於1532年），第四篇明言出自《玉堂漫筆》（陸深〔1477-1544〕撰）。（1616年版，國立中央圖書館珍藏善本；《中國史學叢書》，臺灣，學生書局影印，1965），卷118，葉109上-115下。

4 《明書》（《叢書集成初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1937），卷160，頁3162-3163。

5 《明史稿》（乾隆年間〔1736-1795〕刊本；台北，文海出版社影印，1962），卷176，葉7下-8下。

6 《太嶽太和山志》有明鈔本及明宣德間（1426-1435）刻本傳世。鈔本殘存十三卷（缺頁碼）；刻本為十五卷。北平圖書館藏善本書，美國國會圖書館顯微膠片，Nos. 406及404。鈔本卷六有《張全式傳》（按：「全式」或作「全一」，為三丰之名）；刻本，據筆者所見，則恰恰缺了卷六。本文所用的三丰傳即見於鈔本，卷6，葉13下-15下（頁碼係本人推算而得）。《太嶽太和山志》成書於宣德六年（1431），見任自垣《進太嶽太和山志表》，《太嶽太和山志》（明刻本），葉1上-2下。本文所引用的《太嶽太和山志》，除卷六用鈔本外，其他各卷均用刻本。

7 《遼東志》（1537版；《中國邊疆史地叢書初編》，台灣，台聯國風出版社影印，1969），卷6，頁473-474。

8 《陝西通志》（1542年版；北平圖書館藏善本書，美國國會圖書館顯微膠片，Nos. 371-372），卷36，葉11上下。

9 《南陽府志》（1576年版；北平圖書館藏善本書，美國國會圖書館顯微膠片，Nos. 387），卷18，葉23下，25上。

10 《襄陽府志》（1584年版），卷41，葉12上-13上。

11 《汝州志》（1596年版），卷3，葉35下-36上。

(1607年進士)與陳大道(1586年進士)的《四川總志》、<sup>12</sup> 馮任與張世雍的《成都府志》<sup>13</sup> 亦有他的記載。明代的文人筆記,如陸深(1477—1544)的《玉堂漫筆》、<sup>14</sup> 祝允明(1460—1526)的《野記》、<sup>15</sup> 徐禎卿(1479—1511)的《異林》、<sup>16</sup> 楊儀(1526年進士)的《高坡異纂》、<sup>17</sup> 郎瑛(1487—?)的《七修續稿》、<sup>18</sup> 沈德符(1578—1642)的《(萬曆)野獲編》<sup>19</sup> 等都可以找到有關他的材料。至於神仙傳記一類的書籍固然有他的傳記或甚至神話的記載。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要算洪應明(約1596年前後生存)的《消搖墟經》<sup>20</sup> 和徐道(約1700年前後生存)的《神仙通鑑》。<sup>21</sup>

以上有關張三丰的記載,平實怪誕不等,比較平實的自然是《明史》一類的史籍;其他三類——地方志、文人筆記、神仙傳記,大都是荒誕不經的。當然其中有較平實的記載,如任自垣的《太嶽太和山志》就是。然而,實錄如《明史》,亦不免對張三丰有怪異的描述,如:

寒暑惟一衲一蓑,所啖,升斗輒盡,或數日一食,或數月不食,……,游處無恆,或云能一日千里。……一日自言當死,留頌而逝,縣人共棺殮之。及葬,聞棺內有聲,啓視則復活。<sup>22</sup>

稱為正史的《明史》尚如此,以記錄怪事為目的之一的文人筆記及專事採錄傳說神話的神仙傳記自然更是怪誕得不可置信了。

這裏我們不去研究張三丰的怪誕活動,亦不去研究他的一般事蹟(傳說中的事蹟),<sup>23</sup> 只是想探究一下他和明代諸帝的「關係」而已。

在有關張三丰的材料裏,大都提及明太祖(1368—1398在位)和成祖(1403—1424

<sup>12</sup> 《四州總志》(1619年版;北平圖書館藏善本書,美國國會圖書館顯微膠片, Nos. 398-399), 卷8, 葉85上。

<sup>13</sup> 《成都府志》(1621年版;北平圖書館藏善本書,美國國會圖書館顯微膠片, Nos. 905-906), 卷29, 葉15下-16上。

<sup>14</sup> 《玉堂漫筆》,收《國朝獻徵錄》,卷118, 葉114下-115下。亦收入《廣百川學海》(清版, 台北, 新興書局影印, 1970), 葉7下-9上。

<sup>15</sup> 《野記》,收李拭編《歷代小史》(明刻本;上海, 涵芬樓影印, 1940), 冊25, 卷79, 葉56上-57上。

<sup>16</sup> 《異林》(清版,《廣百川學海》本,台北, 新興書局影印, 1970), 葉7下-9上。

<sup>17</sup> 《高坡異纂》(《古今說部叢書》本,上海, 國學扶輪社, 1910-13), 卷上, 葉2上-3下。

<sup>18</sup> 《七修類稿》《續稿》(北京, 中華書局, 1959), 卷4, 頁801-802。

<sup>19</sup> 《(萬曆)野獲編》(扶荔山房板, 1827)卷27, 葉35下-36下。

<sup>20</sup> 《消搖墟經》(《道藏》本,冊1081, 上海, 涵芬樓影印, 1924-1926), 卷2, 葉39下-40上。

<sup>21</sup> 《神仙通鑑》,又名《歷代神仙通鑑》(1700年版), 卷21, 節6, 葉3下-5下; 節9, 葉2下-3上, 葉6上-7上; 卷22, 節3, 葉3上-5下。

<sup>22</sup> 全註2。

<sup>23</sup> 關於張三丰的一般事蹟與怪誕活動,可參看拙文“The Cult of Chang San-feng”, 前引;又可參看 Dr. Seidel, A., “A Taoist Immortal of the Ming Dynasty: Chang San-feng” in Wm. Theodore de Bary (ed.), *Self and Society in Ming Thought*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70), pp. 483-531。

在位)訪尋張三丰的事,而且都言之鑿鑿。關於明太祖訪尋張三丰的記載很多,最早的大概是成書於明宣德六年(1431)的任自垣編的《太嶽太和山志》。它說:

〔洪武〕二十四年(1391)太祖皇帝遣三山高道使于四方,清理道教,有張玄玄(按:玄玄為張三丰之字)可請來。<sup>24</sup>

明何喬遠(1586年進士)《名山藏》亦有此記載:

太祖晚年聞其(按:張三丰)名,四求不得。<sup>25</sup>

至於明太祖為甚麼要訪尋張三丰,則不見有甚麼明確記載。但相信大概不外兩個原因:一是出於好奇心或對張三丰的景仰,一是希望張三丰能給他一點仙藥(或稱為仙丹);而後者的可能性較高。

根據明太祖《御製周顛仙人傳》和《御製赤腳僧詩》所載,太祖晚年是頗愛或需要服食仙藥的。《御製周顛仙人傳》說:

〔洪武二十五年〕(1392)朕患熱症,幾將去世,俄赤腳僧至,言天眼尊者及周顛僊人遣某送藥至。……朕遂服之。……當夜病愈。精神日強一日。服過三番,乃聞有菖蒲香,盞底有丹砂沉墜,鮮紅異世有者。……<sup>26</sup>

《御製赤腳僧詩》亦有類似的記載:

……神憐黔首增吾壽,丹餌來臨久疾瘳。<sup>27</sup>

所謂「丹餌」就是丹藥,即俗稱的仙藥或仙丹,而《御製周顛仙人傳》所說的「丹砂」則是仙藥的一種。葛洪(約280—340)《抱朴子》說:

仙藥之上者丹砂,次則黃金,次則白銀,……<sup>28</sup>

明太祖於洪武二十四年(1391)遣人四處訪尋張三丰,似乎與其晚年服食仙藥不無關係。張三丰是被人認為是「神仙中人」的,<sup>29</sup>據一般人理解,神仙正是仙藥的製造者。患有嚴重疾病的明太祖甚有可能要找他乞求仙藥的。不過,至於《御製周顛仙人傳》和

<sup>24</sup> 《太嶽太和山志》,卷6,葉15上。

<sup>25</sup> 《名山藏》(1640年版,台北,成文出版社影印,1971),卷7,葉4下。

<sup>26</sup> 《御製周顛仙人傳》,收《紀錄彙編》(明萬曆刻本,上海,涵芬樓影印,1938),卷6,葉5上下。

<sup>27</sup> 見《紀錄彙編》,卷6,葉6下。

<sup>28</sup> 《抱朴子》(《諸子集成》本,上海,國學整理社,1935),頁44。

<sup>29</sup> 《太嶽太和山志》之《張全式傳》說:“……或三五日一食,或兩三月一食;興來穿山走石,倦時鋪雲臥雪;行無常行,住無常住;人皆異之,咸以為神仙中人也。”卷6,葉14下。

《御製赤脚僧詩》所錄太祖服仙藥事，語涉怪異，真相是否如此，不可確知，我們自然不能盡信。

太祖雖然大事訪尋張三丰，可是始終找不到他。但亦有記載謂太祖曾見過張三丰的。清代覺羅石麟等編的《山西通志》說：

明太祖咨以時務，〔張三丰〕曰：「惟本忠孝。」<sup>30</sup>

然而，這條材料的可靠性很低。<sup>31</sup> 若果明太祖真是找到張三丰的話，成書時代距離洪武年間(1368—1398)並不太遠的《太嶽太和山志》不應沒有記載；而傅維麟的《明書》、王鴻緒的《明史稿》及張廷玉(1672—1755)的《明史》等比較嚴肅的史書都明言太祖找不到三丰。《明書》說：

明年(指洪武二十四年，1391)，太祖遣三山道士請〔張〕玄玄造朝，了不可見。<sup>32</sup>

《明史稿》說：

太祖故聞其名，洪武二十四年(1391)遣使徧覓之，不遇。<sup>33</sup>

《明史》說：

太祖故聞其名，洪武二十四年(1391)遣使覓之，不得。<sup>34</sup>

根據以上史籍的記載，太祖徧覓三丰而不得應當是事實吧。

至於明成祖訪尋張三丰一事，因為與政治有關，所以記載特多。大多數史家認為成祖之所以使人訪尋張三丰只是藉口，目的是為了查探可能已出亡的惠帝(1399—1402在位)的下落。「靖難之役」<sup>35</sup>後，成祖為了要查明惠帝失蹤的真相，於是派人分水陸兩路

<sup>30</sup> 《山西通志》(1734年編纂，1811年增修本；台北，華文書局影印，1969)，卷160，葉10下。

<sup>31</sup> 《山西通志》所載的《張三丰傳》充滿傳奇性，可靠程度甚低，如說張三丰「途遇麻姑，教以服四味龍芽」(卷160，葉10上)，就絕不可信，因為據說麻姑是王方平(約147-167)的妹子，而王方平是東漢時人。生於明代的張三丰如何能及見東漢時的麻姑呢？這些怪誕不經的記載使我們不能相信太祖曾見過張三丰是事實。有關麻姑的傳說，可參看杜光庭(850-933)《墉城集仙錄》(《道藏》，冊561)，卷4，葉10下-13上；趙道一(十三世紀時人)《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道藏》，冊150)，卷3，葉5上下；洪應明《消搖墟經》，卷1，葉29上-30上。

<sup>32</sup> 前引，卷160，頁3162。

<sup>33</sup> 前引，卷176，葉8上。

<sup>34</sup> 全註 2。

<sup>35</sup> 「靖難之役」一事是這樣的：明太祖在位時，有見於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於是恢復封建制，分封諸子，屏藩王室。洪武三十一年(1398)太祖崩，孫惠帝嗣立，深感諸王皆擁重兵，漸凌驕橫，因此從尚書齊泰(1388年進士，1402年卒)、太常卿黃子澄(1385年進士，1402年卒)之議，謀減削諸國的勢力。其叔燕王棣(即後來之成祖)知將不保，與僧道衍(即姚廣孝，1335-1418)謀，起兵反，指齊、黃為姦臣，上書於朝，請清君側，號為「靖難」。諸鎮守將相繼叛降，燕兵聲勢，日益浩大。是役先後四年，雙方互有勝負。及宦官竇以京師空虛告燕王，燕王揮戈南下，渡江克金陵。曹國公李景隆(1402年前生存)叛降，納燕兵入都城。宮中火起，惠帝不知所終。或曰，由地道出亡。燕王自立為帝，殺齊、黃諸人。「靖難之役」可參看《明史》，卷4《恭閔帝本紀》，卷5《成祖本紀》，頁59-77。

偵查。水路方面則使三保太監鄭和（約1405—1430前後生存）主其事，陸路方面則派都給事中胡濙（1375—1463）負責。

李賢（1408—1466）《胡濙神道碑銘》說：

丁亥（按：即永樂五年，1407）上（按：指明成祖）察近侍中惟公（按：指胡濙）忠實可託，遂命公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爲名，實察人心向背。<sup>36</sup>

所謂「察人心向背」就是說查察百姓的心是否已歸成祖或是仍向惠帝，內裏自然涵有查察惠帝是否仍然生存和仍負衆望的意思；而“以訪異人爲名”的異人正是我們要談的張三丰。王鏊（1450—1524）《震澤紀聞》說：

太宗（即成祖）師渡江，薄都城，建文君闔宮自燔死，然或傳實自火逃去，或傳蜀府兵來赴難，竊載以去，莫察其實，故遣胡濙巡行天下，以訪張仙爲名，實爲建文也。<sup>37</sup>

陳建（1497—1567）《皇明通紀法傳錄》說：

〔永樂五年〕十二月命戶科都給事中胡濙，巡遊天下，搜訪異人張三丰。上察近侍中以濙忠實可託，命徧行天下，以搜訪異人爲名，實察人心向背。<sup>38</sup>

鄭曉（1499—1566）《今言》說：

成祖遣禮科都給事中胡濙名求〔張〕儼傷，實是訪故君云。<sup>39</sup>

引文中的張仙、張儼傷即是張三丰。<sup>40</sup> 再看《明史·胡濙傳》：

惠帝之崩於火，或言遜去，諸舊臣多從者，帝（按：指成祖）疑之。〔永樂〕五年（1407）遣〔胡〕濙頒御製諸書，並訪仙人張邈邈，徧行天下州郡鄉邑，隱察建文帝安在。<sup>41</sup>

<sup>36</sup> 《胡濙神道碑銘》，收《國朝獻徵錄》，卷33，葉17下。

<sup>37</sup> 《震澤紀聞》（明嘉靖三十年（1551）刻本），卷1，葉3下-4上。

<sup>38</sup> 《皇明通紀法傳錄》（崇禎間（1628-1644）崇文堂刊本，國立中央圖書館顯微膠片），卷14，葉39上。

<sup>39</sup> 《今言》，收《紀錄彙編》，卷146，葉12上。

<sup>40</sup> 在各種張三丰的傳記或有關他的材料裏，我們發現他有許多不同的名號，如「全式」、「全一」、「玄玄」、「三丰」、「三伴」、「三峯」、「三丰遜老」、「通」、「玄一」、「君實」、「君寶」、「居寶」、「昆陽」、「保和容忍三丰子」、「保合容忍三丰子」、「刺蜀」、「邈邈」、「邈邈張仙人」、「儼傷」、「躑躅」、「躑躅張」、「邈邈張」、「躑躅仙」等等。其中「刺蜀」、「邈邈」……那些稱號，有的是形似，有的是音近，有的是義同。大概記載的人先得其音，由音而生義，然後以正確或普通的文字紀錄下來，意即是「不潔」。在《太嶽太和山志》的《張全式傳》裏，以記載張三丰名「全式，字玄玄，號三伴」，卷6，葉13下。《明史·張三丰傳》說他「名全一，一名君寶，三丰其號也」全註2。

<sup>41</sup> 《明史》，卷169，頁4534-35。

此處比較詳細地記載成祖「隱察建文帝安在」的方法：除了以訪尋張三丰為名外，更以「頒御製諸書」<sup>42</sup>為藉口。由於胡濙追尋惠帝下落不能公開進行，故以頒佈御書、訪尋張三丰為掩飾，避人耳目，以便執行他的秘密而重要的偵查任務。這裏我們不禁要問，為甚麼成祖在芸芸衆多「仙人」之中獨選出張三丰呢？這大抵與他特別尊崇張三丰有密切關係。在一些材料裏，我們發覺成祖訪尋張三丰並不是虛有其名的，而實在是誠意的。任自垣《太嶽太和山志》說：

永樂初，太宗文皇帝（按：即成祖）慕其（按：指張三丰）至道，致香書累遣使臣請之，……<sup>43</sup>

姚福（約1465—1487）年前後在世）《青溪暇筆》說：

太宗嘗命數十人乘傳天下訪求之，……<sup>44</sup>

祝允明《野記》說：

太宗未登極時，喇闐（按：即張三丰，喇闐為其號之一）異蹟甚多，比即位，不復見，乃命胡忠安濙馳傳徧索於天下，不限時月，……<sup>45</sup>

據陸深《玉堂漫筆》，與胡濙同往訪尋張三丰的有詹事府主簿張朝用；<sup>46</sup>據楊儀《高坡異纂》，則有道錄任一愚和岷州指揮楊永吉；<sup>47</sup>據藍田（1477—1555）的《張三丰真人傳》，則有司攝監太監朱祥。<sup>48</sup>又《明史·胡濙傳》記胡濙從永樂五年（1407）起徧行天下訪尋張三丰歷十年之久，至永樂十四年（1416）乃還。<sup>49</sup>成祖如此勞師動衆努力不懈地訪尋張三丰，不可謂沒有誠意了。

胡濙訪尋張三丰不成功，成祖覺得不甘心，故於永樂十五年（1417）遣寶雞醫官蘇欽等齋香書遍訪名山求之，又遣龍虎山道士奉書請之。<sup>50</sup>實際上，根據《玉堂漫筆》及《名山藏》的記載，早在永樂三年（1405）成祖已遣淮安王宗道徧訪張三丰於天下名山了。王宗道一訪便是十年，竟無所遇而還。<sup>51</sup>又在王宗道及胡濙等訪尋張三丰的同時，

<sup>42</sup> 「頒御製諸書」事亦見李賢撰《胡濙神道碑銘》。《銘》曰：「時御製《性理大全》，為善陰隨孝順事實，書成，俾公（按：指胡濙）以此勸勵天下。」前引，葉17下-18上。

<sup>43</sup> 前引，卷6，葉15上下。

<sup>44</sup> 《青溪暇筆》，收《紀錄彙編》，卷128，葉8上。

<sup>45</sup> 前引，葉57上。

<sup>46</sup> 《玉堂漫筆》（《廣百川學海》本），葉8上。

<sup>47</sup> 前引，卷上，葉2上。

<sup>48</sup> 《張三丰真人傳》，收《國朝獻徵錄》，卷118，葉110上。

<sup>49</sup> 全註41。

<sup>50</sup> 全註46。

<sup>51</sup> 《玉堂漫筆》，葉8下；《名山藏》，葉5上。

正一教<sup>52</sup>的第四十三代天師張宇初（1410年卒）亦被派往訪尋張三丰。《漢天師世家》記載：

戊子（按：即永樂六年，1408）十月〔成祖〕手勅俾邀請真仙張三丰。己丑（按：即永樂七年，1409）再勅尋訪張三丰。<sup>53</sup>

永樂十年（1412）二月初十日成祖致三丰的御書最能表示他渴見及仰慕三丰之心。書曰：

皇帝敬奉書真仙張三丰（按：「丰」與「丰」通）先生是下：朕久仰真仙，渴思親承儀範，嘗遣使致香奉書，遍詣名由虔請。真仙道德崇高，超乎萬有，體合自然，神妙莫測，朕才質疎庸，德行菲薄，而至誠願見之心夙夜不忘。敬再遣使謹致香奉書虔請，拱候雲車風駕，惠然降臨，以副朕拳拳仰慕之懷。敬奉書。<sup>54</sup>

又於同年三月初六日賜正一教道士孫碧雲（約1403—1424年前後生存）的詩說：

若遇真仙張有道（按：即張三丰），爲言佇候長相思。<sup>55</sup>

成祖不僅屢次遣人長時期地徧訪張三丰，而且由於景仰張三丰，勅孫碧雲在武當山特爲他創建道場。他的勅是製於永樂十年（1412）三月初六日的，內云：

朕聞武當遇真〔宮〕實……真仙老師鶴馭所遊之處，不可以不加敬，今欲創建道場以伸景仰欽慕之誠。爾（按：指孫碧雲）往審度其地，相其廣狹，定其規制，悉以來聞。朕將卜日營建。爾宜深體朕懷，致宜盡力，以成協相之功。……<sup>56</sup>

明方升（十六世紀時人）《大嶽志》的記載進一步的證實此事：

〔玉虛〕宮在展旗峯北遇真故址，爲真仙張三丰之庵。……文皇（按：即成祖）徧訪物色不可得，遂大其宮以爲祝釐之所。<sup>57</sup>

<sup>52</sup> 正一教即五斗米道或稱爲天師道。五斗米道爲東漢張陵（或稱張道陵，約25-156前後生存）所創。因當時從張陵受道的，人出五斗米，故名。見《三國志·魏書·張魯傳》，卷8，頁263-265。晉代以後則稱爲天師道。自元代起，又稱正一教。一般來說，正一教是屬於畫符念咒的符籙派。關於正一教的文獻頗多，最主要的相信是張正常（1335-1377）編，張宇初（1410卒）校及張國祥（約1577-1607年間在世）補的《漢天師世家》，收入《道藏》，冊1066。

<sup>53</sup> 《漢天師世家》（《道藏》本，冊1066），卷3，葉29上。

<sup>54</sup> 見《太嶽太和山志》，卷2，葉4下。

<sup>55</sup> 見《太嶽太和山志》，卷2，葉6上。孫碧雲爲永樂年間（1403-1424）的著名道士。永樂十年（1412）任道錄司右正一，又任太嶽太和山大聖南巖宮住持。《太嶽太和山志》，卷7，葉4上-8上有傳。

<sup>56</sup> 全上，卷2，葉5上。

<sup>57</sup> 《大嶽志》（見《名山勝蹟記》，明崇禎六年（1633）刻本），「玉虛宮六圖述」，葉10下。

但根據《明史》記載，則成祖不只為張三丰改建遇真宮為玉虛宮那麼簡單，《張三丰傳》說：

永樂中，成祖遣給事中胡濙偕內侍朱祥齋壘書香幣往訪，遍歷荒徼，積數年不遇。乃命工部侍郎郭璉、隆平侯張信等，督丁夫三十餘萬人，大營武當宮觀，費以百萬計。既成，賜名「太和太岳山」，設官鑄印以守，……<sup>58</sup>

可是這樣的記載頗嫌疏畧。不錯，成祖真的曾經「大營武當宮觀，費以百萬計」，但目的不是為了景仰張三丰，而是為了崇祀玄帝。<sup>59</sup>這點可證之以永樂十年（1412）七月十一日的「黃榜」：

皇帝諭官員軍民夫匠人等：武當，天下名山，是北極真武玄天上帝修真得道顯化去處，歷代都有宮觀，元末被亂兵焚盡，至我朝真武闡揚靈化，陰佑國家，福庇生民，十分顯應，我自奉天靖難之初，神明顯助威靈，感應至多，言說不盡。那時節已發誠心要就北京建立宮觀，因為內難未平，未曾滿得我心願。及即位之初，思想武當正是真武顯化去處，即欲興工創造。緣軍民方得休息，是以延緩到今。如今起倩些軍民去那裏創建宮觀，報答神惠，上資薦揚皇考皇妣，下為天下生靈祈福，用工夫不多，至容易，不難，特命隆平侯張信、駙馬都尉沐昕等把總提調管工官員人等，……<sup>60</sup>

在武當山創建宮觀的動機與目的在此「黃榜」裏是說得很清楚的。我們更可證之以其他文字。如《孝宗實錄》：

太宗（按：即成祖）入靖內難，以神（按：指玄帝）有顯相功，又於京城艮隅并武當山重建廟宇。兩京歲時朔望各遣官致祭，而武當山又專官督視祀事。<sup>61</sup>

<sup>58</sup> 全註2。

<sup>59</sup> 玄帝是玄武之尊稱，是北宮七宿之神，其形似龜蛇合體。玄武之名最早見於《楚辭·遠遊》。北宋真宗祥符年間（1008-1016）改稱為真武，因為要避宋太祖趙匡胤（玄朗）之諱。在《道藏》裏至少有十七種著作是與玄帝有關的：冊27（兩種）、83、345、530-531、556（兩種），567（三種），606-608（三種），609（兩種），981、1108。也有人把玄帝的神話寫成小說的。明代福建書商余象斗（活動時代可能在1602之前）的《北方真武祖師玄天上帝出身全傳》就是其一。筆者所見者為清刻本《四遊記》本，共二冊，四卷，二十四回。柳存仁教授對此書之萬曆三十年（1602）刻本作過頗詳細的書錄，見其所著《倫敦所見中國小說書錄》（香港，龍門書店，1967），頁202-204。研究玄帝的文章不多，值得一讀的有：許道齡撰的《玄武之起源及其蛻變考》，見《史學集刊》，第五期（1947年，十二月），頁223-240；Willem A. Grootaers, "The Hagiography of the Chinese God Chen-wu", *Folklore Studies*, Vol. XI, No. 2, (東京, 1952), pp. 139-181。又，可參看拙文《玄帝考》，見《馮平山圖書館金蘭紀念論文集》（香港大學，1982），頁241-264。

<sup>60</sup> 見《太嶽太和山志》，卷2，葉6下-7上。

<sup>61</sup> 《孝宗實錄》（取《明實錄》，冊51，國立北平圖書館紅格抄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影印，1964），卷13，葉9下。



又如王世貞（1526—1590）《名卿續紀·姚廣孝傳》：

燕王既以定京師，……遣使於武當山營玄武宮殿，楣柱甃甃，悉用黃金。是時天下金幾盡。<sup>62</sup>

又如朱國楨（1557—1632）《湧幢小品》：

〔文皇〕（按：即成祖）而於道教，惟太和山一役，則因嘿祐之功，竭兩朝物力表其巔，至今奔走四海。<sup>63</sup>

但是，謂「靖難」之事得玄帝相助自然是荒誕之詞，大有可能是姚廣孝（1335—1418）輩使用掩眼幻術，假號神佑，以堅定成祖起兵之志的。<sup>64</sup>

不過，雖然成祖在武當山大事營建宮觀是為了崇祀玄帝，但是實際上也同時為了景仰張三丰而「創建道場」；而且，他訪尋張三丰實是出自誠意的。從以上的討論可知。

成祖又是為了甚麼原因使人訪尋張三丰呢？

倘若我們相信成祖給張三丰的信及賜孫碧雲的詩所言是真實的話，自然是為了對張三丰的景仰。可是，相信實情並不如此簡單的。我以為至少還有兩個原因：一是成祖與張三丰同奉玄帝，二是成祖像太祖一樣為求仙藥。

成祖崇奉玄帝是因為他相信玄帝曾助他靖難，此點上文已及；另外一個原因是他亦相信或至少有目的地佯作相信玄帝亦曾助太祖平定天下。<sup>65</sup> 成祖《御製太嶽太和山道宮之碑》說：

朕皇考太祖高皇帝以一旅定天下，神（按：指玄帝）陰翊顯佑，靈明赫奕。朕起義兵，靖內難，神輔相左右，……<sup>66</sup>

又在其《御製真武廟碑》說：

昔朕皇考太祖高皇帝乘運龍飛，平定天下，雖文武之臣克協謀佐，實神有以相之。肆朕肅靖內難，雖亦文武不二心之臣疏附先後，奔走禦侮，而神之陰翊默贊，……迹尤顯著。<sup>67</sup>

<sup>62</sup> 《名卿續紀》（收《紀錄彙編》），卷3，葉5下。

<sup>63</sup> 《湧幢小品》（收《筆記小說大觀》，第二輯，上海，進步書局石印本，出版年不詳），卷32，葉11下。

<sup>64</sup> 楊啟樵君曾提出此說，本人對他的見解頗為贊同。見楊著《明代諸帝之崇尚方術及其影響》，《新亞書院學術年刊》（香港，1962），第四期，頁14。

<sup>65</sup> 如果成祖是有目的地佯作相信玄帝亦曾助太祖平定天下的話，大概他是為了要把這些怪事說成由來已久——太祖時已有同樣事情發生，以減少一般人民對他會得玄帝相助的懷疑或加強他們對他的尊敬。

<sup>66</sup> 見大概是明人撰的《大明玄天上帝瑞應圖錄》（《道藏》本，冊608），葉2上。

<sup>67</sup> 全上，葉1上下。此《碑》文撰於永樂十三年（1415）八月，附於《大明玄天上帝瑞應圖錄》之後，頁碼獨立，表面上似與《圖錄》無關，然實為《圖錄》之一部份，因為此冊卷首目錄並無《御製真武廟碑》一目。

恰巧三丰也是崇奉玄帝的。《太嶽太和山志·張全弑傳》記載：

〔張三丰〕洪武初來入武當，拜玄帝於天柱峯。<sup>68</sup>

明任洛等編的《遼東志》亦記載說：

〔張三丰〕又入武當，謁玄帝於天柱峯。<sup>69</sup>

成書於萬曆十二年（1584）的《襄陽府志》亦有相似的記載：

〔張三丰〕又尋展旗峯北陲，卜地結草菴，奉玄帝香火，……<sup>70</sup>

成祖既奉玄帝，今見異蹟滿天下的張三丰也像自己一樣奉玄帝，正所謂同氣相投，自然產生一種認同感。這崇奉對象的相同，很有可能促使他訪尋張三丰。

成祖求仙藥大抵是由於他晚年有疾，而有疾一事是肇於永樂十五年（1417）的。明楊士奇（1365—1444）《東里文集·梁用之墓碣銘》說：

永樂十五年（1417），〔成祖〕車駕巡狩北京，仁宗皇帝在春宮，監國南京。……上（按：指成祖）既有疾，兩京距隔數千里，支庶萌異志者，內結嬖倖，飾詐為間，……<sup>71</sup>

又楊氏《三朝聖諭錄》說：

〔宣德三年（1428）〕六月間，一日早朝罷，召楊榮及臣〔楊〕士奇至文華門，命光祿賜食，既〔畢〕，上（按：指宣宗）曰：「吾三人商量一事：京師端本澄源之地，祖宗時朝臣無貪者，年來貪濁之風滿朝，何也？」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作，但至今甚耳。」上問：「永樂何如？」對曰：「十五、六年以後，太宗皇帝有疾，多不出，扈從之臣放肆無顧藉，請託賄賂，公行無忌。……」<sup>72</sup>

爲了醫治疾病，成祖時服靈濟宮<sup>73</sup>仙方。《明史·袁忠徹傳》云：

<sup>68</sup> 前引，卷6，葉14下。

<sup>69</sup> 前引，卷6，頁473。

<sup>70</sup> 前引，卷41，葉12下。

<sup>71</sup> 《東里文集》（嘉靖（1522-1566）刻本），卷17，葉6下-7上。

<sup>72</sup> 《三朝聖諭錄》，轉引王崇武《明成祖與方士》，《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卷8，第1期（南京，1949年1月），頁13。

<sup>73</sup> 靈濟宮的興建歷史見《太宗實錄》，「永樂十五年三月辛丑」條，（收《明實錄》），卷186，葉3上下。靈濟宮內所奉祀之神爲徐知諤及徐知證（「證」有誤作「諤」者）兄弟，爲五代時名將徐溫（927年卒）之子，死於軍中，後被尊爲神。宋理宗時被封爲「靈濟真君」。《道藏》裏有多種著作是與徐氏兄弟有關的，如冊264（七種）、265（兩種）1011、1012、1083-1085、1086-1088。

禮部郎周訥自福建還，言閩人祀南唐徐知諤、知誨，其神最靈。帝（按：指成祖）命往迎其像及廟祝以來，遂建靈濟宮於都城，祀之。帝每遘疾，輒遣使問神。廟祝詭為仙方以進，藥性多熱，服之輒痰壅氣逆，多暴怒，至失音，中外不敢諫。〔袁〕忠徹一日入侍，進諫曰：「此痰火虛逆之症，實靈濟宮符藥所致。」帝怒曰：「仙藥不服，服凡藥耶？」……<sup>74</sup>

可見成祖是極迷信這些所謂仙藥的。《洪恩靈濟真君事實》一書便載有他極力讚頌徐氏二真君的文字。其中撰於永樂十五年（1417）的《禦製靈濟宮碑》說：

乃者朕躬弗豫，用藥百計，罔底于效，神默運精靈，翊衛朕躬，頃刻弗違，隨叩隨應，屢顯明徵，施以靈符，天醫妙藥，使殆而復安，仆而復起，有回生之功，恩惠博矣盛矣。<sup>75</sup>

由此可確證成祖對於「神」所施的仙藥是深信不疑的。張三丰既被認為是神仙，具有不尋常法力，成祖訪尋他的理由之一極有可能是為了向他求取仙藥。這一點文獻上雖然沒有直接記載。前文已經提過成祖曾遣寶雞醫官蘇欽等齋香書遍訪名山求張三丰一事，我認為這點至值得玩味。事情是發生於永樂十五年（1417）的，正是成祖得疾之時；而被遣往訪尋張三丰的又是一名醫官，這大概很難說與成祖之疾無關吧。倘若有關，則自然是想從張三丰的身上得到一些所謂仙藥去治成祖的病了。

可是成祖並不會訪到張三丰，這早在《太嶽太和山志》裏已指出來了。《山志》說：

永樂初，太宗文皇帝慕其至道，致香書累遣使臣請之，不獲。<sup>76</sup>

不過亦有一些記載謂成祖曾見過張三丰的。如徐禎卿的《異林》：

〔張刺達〕（按：即是張三丰）國初時（按：指明初）往往遊人間，每顯異迹。太宗時開邸北平，嘗召見之，語有神異。及即位，思慕甚篤，遣胡尚書濬遍海嶽間求訪之，後于秦中邂逅，宣述聖意，……張公曰：「謹奉詔。但道遠日久，公先就駕，予當繼至耳。」既而胡方入朝，張公果至，帝延入，……<sup>77</sup>

萬曆年間（1573—1620）編成的《南陽府志》：

時永樂御，極以禮徵之（按：指張三丰），一見忽別。<sup>78</sup>

<sup>74</sup> 《明史》，卷299，頁7644。

<sup>75</sup> 見《洪恩靈濟真君事實》（《道藏》本，冊265），葉1下。關於明成祖服食仙藥的詳情，可參看王崇武《明成祖與方士》，前引，頁12-19。

<sup>76</sup> 前引，卷6，葉15上下。

<sup>77</sup> 前引，葉8上下。

<sup>78</sup> 前引，卷18，葉25上。



同時期的《青州府志》：

太宗賜號「三丰」後，莫知所終。<sup>79</sup>

《潁州志》裏張鶴騰（1595年進士）撰的《張三峯傳》：

永樂靖難時，一日〔張三峯〕自浣敝衲，且浣且呼曰：「召來！召來！」人皆笑其狂。次日，召果至。至徐州遇駕。後五年遣胡濙訪異人張三峯，蓋思之耳。<sup>80</sup>

然而，這些記載較《太嶽太和山志》晚出，且神話成份過濃，是不足為信的。《明書》、《明史稿》和《明史》等史籍成書時期較這些記載為遲，它們的編者不可能見不到這些材料，但亦不採成祖見過張三丰之說。<sup>81</sup>可見嚴謹的學者是不相信有這回事的。

經過以上的討論，可知成祖在訪尋惠帝的同時亦是訪尋張三丰的（雖然兩者的重要程度不可平列），而且實是出自一番誠意；也可能是有特殊的目的——求仙藥。

上文說過，永樂十五年（1417）成祖仍有訪尋三丰之舉。但之後便沒有他再訪尋三丰的記載了——至低限度沒有直接的記載了。《明史·胡濙傳》有一段文字是頗值得注意的：

〔永樂〕五年（1407），〔成祖〕遣〔胡〕濙頒御製諸書，並訪仙人張邈邈，徧行天下州郡鄉邑，隱察建文帝安在。濙以故在外最久，至十四年（1416）乃還。……十七年（1419）復出巡江、浙、湖、湘諸府，二十一年（1423）還朝，馳謁帝於宣府。帝已就寢，聞濙至，急起，召入。濙悉以所聞對，漏下四鼓乃出。先濙未至，傳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釋。<sup>82</sup>

細細玩味「十七年復出巡……」以下一段文字，審察上文下理，胡濙「出巡」的目的固在訪尋惠帝下落，但是否仍然同時訪張三丰，則無由得知。既然文中沒有指出來或甚至暗示，我們也不妄作猜想了。我們只可以說，永樂十五年以後就沒有成祖訪尋張三丰的記載了。這可能是由於在此之後成祖再無訪三丰之舉了。

為甚麼永樂十五年以後成祖沒有訪三丰之舉呢？大概是因為他得到消息，相信張三丰已不在人世吧。<sup>83</sup>

<sup>79</sup> 王家賓、鍾羽正（1580年進士）等纂《青州府志》（萬曆四十三年（1615）刻，康熙十二年（1673）覆印本），卷17，葉13下。

<sup>80</sup> 張鶴騰（1551-1635）等編《潁州志》（1608年版），卷下，葉80上。

<sup>81</sup> 《明書》只是說：「永樂初，遣給事中胡濙，指揮楊永吉等，徧物色之不可得。十年……二月初六日，詔道士玄虛子往武當，於玄玄舊遊處，建道場，焚書冀有聞焉，竟不獲，……」全註4；《明史稿》亦明言成祖不曾得遇張三丰：「永樂中，成祖遣給事中胡濙偕內侍朱祥齋、書香幣往訪累年，窮陬僻壤皆到，迄不遇。」卷176，葉8上；《明史》亦有同樣的記載：「永樂中，成祖遣給事中胡濙偕內侍朱祥齋、書香幣往訪，遍歷荒徼，積數年不遇。」全註2。

<sup>82</sup> 全註41。

<sup>83</sup> 關於張三丰何時不在人世一事，可參看拙文「The Cult of Chang San-feng」，pp. 43-45。

若然我們相信——實際上亦有理由相信張三丰在永樂十五年以後已不在人世或至少沒有任何活動了，一切有關他在永樂十五年以後的活動的記載自然不可靠。但偏偏却有不少此期間以後有關他的記載。如郎瑛《七修續稿》說張三丰於「天順三年（1459），又來謁帝」<sup>84</sup>。這當然是不足信了，因為除《七修續稿》外，其他明代的文字並不會有同樣的記載。只有清人汪錫齡（1664—1724）撰的《隱鏡編年》採用此說，而且又加入了一段神話，說張三丰鑒英宗（1436—1464在位）之誠，「乃現全神晉謁」等等。<sup>85</sup>若果張三丰真的會謁見英宗的話，《明史》一類的史書似不應沒有記載的。試想，太祖及成祖曾大事訪尋張三丰而終不能得，現在却來謁見英宗，事情頗大，那有不記載之理呢？

又有不少記載謂張三丰於天順（1457—1464）末，「或隱或見」。《高坡異纂》、《遼東志》、鄧球（1535年進士）的《皇明泳化類編》、《名山藏》、《明書》等都有這樣或類似的說法。<sup>86</sup>但「或隱或見」是很不明確或很不負責任的說法，存在與否是沒有確實地指出來的。可推想記載的人亦不確知張三丰在天順末是否存在。所謂「見」只是傳說而已。實際上，三丰在天順年間又如何能「見」呢？

謂天順三年（1459）英宗封張三丰為「通微顯化真人」一事則大抵可信，<sup>87</sup>因為皇帝封贈一個人名號不一定要那個人存在的。《潁州志》說得好，它說：

至英〔宗〕廟封〔張三丰〕為「通微顯化真人」，蓋追崇之，原未召見，傳召見者訛也。<sup>88</sup>

當時三丰已不存在了，英宗自然不會召見他，故追封他為「通微顯化真人」就算了。這完全是出於對三丰的崇敬。英宗之制可見於藍田（1477—1555）撰的《張三丰真人傳》，內云：

爾真仙張三丰，芳姿穎異，雅志孤高，……茲特贈爾為「通微顯化真人」。<sup>89</sup>

制中曾兩次用“爾”字，好像認為張三丰在當時存在，實際上只是當他存在而已。

《武當山志》謂張三丰於正統元年（1436）被封為「通微顯化真人」，<sup>90</sup>大概是傳

<sup>84</sup> 前引，卷4，頁802。

<sup>85</sup> 見李西月（約1844年前後生存）等編《張三丰全集》（《道藏輯要》本，成都二仙庵重刊，1906；台北，考正出版社影印，1971），卷8，葉78上（總頁7833）。

<sup>86</sup> 《高坡異纂》，卷上，葉2上；《遼東志》，卷6，頁474；《皇明泳化類編》（明隆慶間（1567-1572）刊本，台北，國風出版社影印，1965），卷131，葉10上；《名山藏》，卷7，葉6上；《明書》，卷160，頁3163。

<sup>87</sup> 記載此事的很多，較早的見《高坡異纂》，全前註。《明史》也有同樣的記載，說：「天順三年，英宗賜誥，贈為通微顯化真人。」全註2。

<sup>88</sup> 《潁州志》《創建張三峯祠堂記畧》，卷下，葉82上。

<sup>89</sup> 前引，卷118，葉111下。

<sup>90</sup> 《武當山志》，轉引《古今圖書集成》（1726年版，上海，中華書局影印，1934），《神異典》，冊509，卷256，葉61下。

鈔錯誤了，別的書籍並無如此記載。汪錫齡的《隱鏡編年》謂於成化二十二年（1486）詔封張三丰為「韜光尚志真仙」，嘉靖四十二年（1563）封為「清虛元妙真君」，天啓三年（1623）封為「飛龍顯化宏仁濟世真君」，<sup>91</sup>更不知所本，可能是汪錫齡製造出來的罷了。無論如何，永樂以後張三丰其人已不存在或沒有任何活動了。張三丰與成祖以後的皇帝根本上一點關係也沒有。

在這裏要附帶一談的，是張三丰入蜀見蜀獻王椿（1423年卒）一事。關於此事不少記載都提及到，如《明史·張三丰傳》便是一個例子。<sup>92</sup>較早的記載有陸深的《玉堂漫筆》和藍田的《張三丰真人傳》。《玉堂漫筆》說：

洪武壬申（1392）〔張三丰〕常（按：似為“嘗”字之誤）應蜀獻王之召，辭還山。<sup>93</sup>

《張三丰真人傳》說：

癸酉（1393）九月二十日，……三丰復生，後入蜀見蜀獻王。<sup>94</sup>

兩者在時間的記載上雖畧有差別，但記三丰在洪武時入蜀見獻王則並無不同。然而，在各種蜀獻王的傳記中<sup>95</sup>却沒有記載此事。雖則如此，我們亦不能一定以此為藉口去否定其事，正如我們不能以《明史》之《太祖本紀》及《成祖本紀》並無提及他們遣人訪尋三丰便否定他們訪尋三丰之事一樣。蜀獻王是個好客之士，《名山藏》說他「下關西堂，延攬名士」<sup>96</sup>，三丰雖是道流之輩，但德高望重，聲名頗大，獻王也許會樂於接見他的。而且，根據明何宇度（約1573—1600年前後生存）《益部談資》記載，獻王也頗尊重釋道二教的。《益部談資》云：

仙宮佛院，成都頗盛，半創自獻王之國時，累代藩封中貴，從而增益之。殿宇廊廡，華麗高敞，……俱不減兩都規模，足供遊眺。<sup>97</sup>

大概三丰知道獻王尊重釋道二教，認為蜀是個大可宏揚教義的地方，故到蜀去。他見蜀獻王可能是希望得到獻王的支持，使他可以便于宣揚道教。不過，這個推論是否正確，甚至有關三丰入蜀一事是否可靠，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

<sup>91</sup> 見《張三丰全集》，卷8，葉78下-79上（總頁7833）。

<sup>92</sup> 《明史·張三丰傳》說：「……乃遊四川，見蜀獻王。」全註2。


<sup>93</sup> 前引，葉7上下。

<sup>94</sup> 全註48。

<sup>95</sup> 如《名山藏》之《蜀王傳》，卷37，葉1上-2下；《國朝獻徵錄》之《蜀王傳》及《蜀獻王椿傳》，卷1，葉45上-47下；《明史稿》之《蜀獻王椿傳》，《列傳》，卷3，葉24下-26上；《明史》之《蜀王傳》，卷117，頁3579-81。

<sup>96</sup> 前引，卷37，葉1上。

<sup>97</sup> 《益部談資》（《學海類編》本，1831年版，台北，文源書局影印，1964），卷中，葉10下-11上。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 Chang San-feng and the Ming Emperors

(A Summary)

S. H. Wong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Chang San-feng was a Taoist master who flourished between the Yen-yu period (1314-1320) of the yüan dynasty and the fifteenth year of the reign of Ming Emperor Ch'eng-tsu (1417). The biographical accounts of Chang San-feng can be found in important historical compilations, such as the *Ming-shih*, local histories of the Ming dynasty, literary notes written by Ming writers and collections of biographies of immortals. The earliest extant record of Chang's life is possibly that found in the *T'ai-yüeh-t'ai-ho-shan chih* compiled by Jen Tzu-yüan during the reign of Ming Emperor Hsüantsung (reigned 1426-1435). In all these records there is the mention of the search for Chang San-feng by the two Taoist-inclined Ming emperors—Emperor T'ai-tsu (reigned 1368-1398) and Emperor Ch'eng-tsu (reigned 1403-1424).

The reasons why Emperor T'ai-tsu should seek San-feng might be based on two possible grounds. Firstly, the Emperor was curious and attracted to the fame of Chang San-feng. Secondly, the aged sovereign wanted to obtain the elixir of life from the Taoist master. As for the motives behind the earnest search for Chang San-feng by Emperor Ch'eng-tsu, they are more politically related. Emperor Ch'eng-tsu used the search as a pretext to cover his real intention of investigating the whereabouts of his deposed nephew, Emperor Chien-wan (reigned 1399-1402). That Emperor Ch'eng-tsu should decide to single out Chang San-feng from among the numerous Taoist figures as his object is that he was especially attracted to San-feng. From available source material we can see that the Emperor was sincere in inviting San-feng to court, a mission which took over ten years. He even ordered the building of a Taoist altar at Moung Wu-tang to honour San-feng.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why Emperor Ch'eng-tsu should seek San-feng. Firstly, his personal admiration for San-feng. Secondly, he wished to honour Hsüan-ti (Dark God), whom both San-feng and himself worship with pious adoration. Thirdly, Emperor Ch'eng-tsu, like Emperor T'ai-tsu, wanted to see if San-feng had any miraculous cure for sickness. The

search stopped after the fifteenth year of the Yung-lo period (1417), perhaps the Emperor had learned that the Taoist had passed away.

Both Emperor T'ai-tsu and Emperor Ch'eng-tsu failed in their attempts to invite San-feng to court. Although some of San-feng's biographies as found in local histories and literary notes depict the meeting of San-feng with the emperors, yet such accounts are unfounded and should be treated as tales woven round the mysterious San-feng. Also, in some records San-feng is said to have appeared during the T'ien-shun period of Emperor Ying-tsung (reigned 1457-1464), and to have had honours, bestowed on him by Emperor Hsien-tsung (reigned 1465-1487), Emperor Shih-tsung (reigned 1522-1566) and Emperor Hsi-tsung (reigned 1621-1627). Again, all these cannot be supported by reliable historical sources and were very probably later fabrications.

In some sources, San-feng is associated with Prince Hsien of Szechuan (d. 1423), the eleventh son of Emperor T'ai-tsu during the later years of the Hung-wu reign (1368-1398). The authenticity of this anecdote is still open to investigation.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